

321.09  
3418

# 革命與權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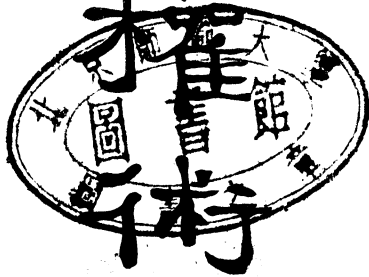
革命叢書

第六種



民國十七年四月

革命與權術



瑞鈞



「爲今之計，惟有首先剷除一切受環境與歷史流毒的權術思想，從『策略萬能』的迷夢中喚醒了我們最有希望的同志，使大家明瞭個人要保持永久的聲名與幸福，只有從造成偉大人格鞏固社會信仰入手。」

## 序

我做這個搭題的動機，已經存之經年了。每於工作之餘，想就了一些「腹稿」；近來盱衡時局，感觸愈多，更覺得不能不做。我動筆之初，思考所及，確有些時間性的存在，後來連類引伸，欲罷不能，不覺又牽上了人生哲學和應用心理學上的問題。所以文中討論的要點，可以離開政局而自有相當的意義。我想，在青年們權謀思想未根本剷絕之先，這篇東西，或者還能在大家心頭起微微的泡沫。

往年我於總理遺教，涵泳未深，每讀宋明諸儒談性理經濟的文字，往往能入而不能出。近來才勘破一些人間之謎，又稍稍受了西方動性哲學(Activism)的濡染，頗想從今以後，另立根基。大概同志們和我走一樣境界的，也很不少。所以在本文裏，有幾處便流露我舊日心靈的創痕，以冀與諸同志，共矢心期。希望此後大家在革命的

征途中，能增加一些天趣。

關於革命道德的基本問題，頭緒繁多，我未能詳為論列。吾友郎醒石同志不久便要著一部書，作系統的討究。本文裏面，不過就其關係切要處提到幾點而已。

更沒有什麼補充的話了。等到同志們發見自己的新生命之一日，我願竭鄙陋的愚誠，再做一點小東西，與諸君相見。

十七年二月九日 瑞劍識於海上寓樓

# 革命與權術目次

- 一 智慧的向上與墮落
- 二 中國民族性的一個解剖
- 三 策略與主義
- 四 怎樣做革命領袖？
- 五 國民革命的一線生機——心理的建設



## 革命與權術

### 一 智慧的向上與墮落

在入題之先，我們有一件應當注意的事；自從蘇格拉底說過一句『智慧即道德』以後，引起後人種種的懷疑與抨擊；而智慧在行爲上的地位怎樣，就成了人生哲學上的重要問題。我們所要明瞭的，乃是智慧的本身，無所謂善，亦無所謂惡；其含有道德上的意義，乃以用言，不以體言。所以本節討論的，不過是關於它在行爲上所發生的種種影響，與它的本身價值無關。

\*

\*

\*

\*

自歐戰以後，一般文人學士，痛心於物質文明的流毒，欲以情意與本能的生活，濟理智之窮。於是中國老莊『絕聖棄智』和盧梭『返乎自然』的主張。最近居然在歐洲大行起來。這種反動是科學萬能的世界所不能免的。其實細想一下，便可明白它們都是『因噎廢食』



之論。從各方面看來，智慧對於人類的貢獻，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我們知道人與動物的分水嶺，就在智慧上面。最初生物的一切行為，完全爲本能，感情，欲望所支配。其對於環境的適應，亦多出於『不自覺』（Unconsciousness。）例如蚱蜢，爲避免人的捕捉，以綠爲保護色；東印度的蝴蝶，大抵色如枯葉，亦欲以避人耳目，下等動物已是如此了。後來生物進化，才發生半意識的行動，因『自存本能』的激刺，而知道怎樣得食，怎樣避害，怎樣保護自己的子女。就鳥類而言，見黑雲湧起，而知雨雹之將至；見鷹隼盤空，而知有遷避之必要，其於環境，已逐漸有特殊的認識力，不過自發活動的意味還是很少罷了。

後來人類產生，情勢便不同了。起初也只有本能欲望與感情的生活，到了歷史演進，才發見『智慧』這個法寶，我們從此不但能適應環境，而且進一步能夠控制它了；對於自身的利害得失是非禍福，以

及一切生存所必需的手段，也漸漸有明確的決斷力了——這樣便造成了一部光華燦爛的人類文明史。

在生物進化的原則上，我們既已證明智慧是人類向上的最大原動力。所以無論那一種思潮——除中國怪僻的道家不算——莫不對它採容受的態度，譬如儒家以『智』與『仁』『勇』並稱；佛家以求『一切智智』爲證『無上菩提』的法門，而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洋各派哲學，亦莫不以智慧爲重。自前世紀之末，純理的科學萬能思想漸漸起了動搖，一班科學的哲學家如馬哈 (Mach) 披爾生 (Pearson) 普因加雷 (Poincaré) 之流，相繼主張科學與知識不過是一種策略 (Policy)，以適應爲目的，隨環境而變易，不是絕對的可靠的。這樣便產生了美國式的實驗主義，而智慧完全變爲一種工具。我舉杜威的思想作例罷，杜威以爲人類都應當含有『作用』 (Function) 以應付外緣。譬如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便想種種方法解決它，以達自身的目的，這時候

智慧的運用便發生了。智慧一定要能夠解決問題，判別利害，才有價值；不然，便是空想和幻覺而已。這是他最著名的『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在美國那種環境裏，產生杜威一派的思想，本無足怪；但是智慧的價值，既因環境而變，遂不免漸呈下降之勢了。

其次，近代西洋思想家中，對於理智最蔑視的，要算是柏格森了。他以爲人類智慧的能力，充其量不過能夠『製造工具』。其所以異於他種生物者，乃在生物恃本能而存活，而人類便能夠以思致力變易環境。譬如削尖了火石，把石頭縛在竿上做一柄鎚子，乃是人類控制自然的初步；人種進步了，這種製造工具的能力也越是發達，所用的工具也更其完滿。最初只能利用物質，後來便能利用一切精神的原素了。柏格森雖不承認智慧是人生的極軌，而大談其『直覺主義』；但是他對於智慧效能的解釋，却往往與實驗主義者有冥合之處。智慧畢竟是最靈奇神秘的東西！

晚近科學方法的進步，使一切人類的行爲，都可以納於理智的分析與推考之下。所以有人說，將來總有一天，任何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變化，因我們智力的進步而都能夠預算他的經過和結果，好像聰明的經紀人預算市價的漲落一樣。這個預言未必是不可能的。總之，今後人類的智慧，一定要給我們以永遠所夢想不到的貢獻。

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智慧的向上，是人類文明進展的最大原動力。如果照那種消極的說法，而企圖去滅絕它，或是破口去咒詛它，其結果非把現代的人類降到同非洲蠻族一樣不止！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欲望和感情的魔力，終究太可怕了，它到現在還能支配人類生活的大部分，並且往往使智慧窮於控制；不但窮于控制，有時候智慧還跟着欲望和感情走，而做了他的工具，釀成許多罪惡，於是社會學上和羣衆心理學上，因此便發生最難解決的問題！

我們知道，智慧之所以釀成罪惡，完全是聽命於欲望所致；欲望的

發生，又因自存本能而來。最初人類賴有智慧，纔戰勝了自然界，而作萬物的權衡。現在對於異類的生存競爭既然終止，其勢必須轉換方向，而與其他個體奮鬥。在自存本能的積極發展之下，因欲望與感情的激動，利害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切戰爭發生的動因。

人類的一切有意識的行爲，莫不含着理智的程序 (Intellectual Process)，換言之，就是一定的目的及其手段。當鬥爭發生時，其目的往往爲消極的，所以進行的方法也以消極方面爲多——尤其是自衛的行動，更須運用智慧以爲解救。在政治上也常常如此，爲達自身的願望計，每不免參有智慧的消極作用。譬如怎樣除暴，怎樣抵禦他方的侵略，其中過程，非運用智慧不爲功。所以有人說：鬥爭和謀殺的行爲，在政治的立場上，有時是可以容許的，我們不能用純粹的道德律裁制他。這話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不過如其動機出乎個人或少數人的私意，欲乘機發展其種種野心，或因支配慾佔有慾的衝激，幹

出殺人放火的事來；甚至於破壞一切道德法律的制限而不顧，如今日共產黨之所爲，那便是人羣進化的蝨賊，我們非撲滅他不可。除此以外，更有用政爭的方式，犧牲民衆幸福，以達其個人的目的，這也是無可諒恕的。

我們曉得欲望與感情所生的罪惡，不能持久，因爲它早晚總要『碰壁』的；只有智慧替他張目，最爲危險。清儒陳榕門說，『小人而無才，亦不得成爲小人。』所以野心家若有精密的策略爲後盾，強固的武力爲工具，便如虎傅翼，無所不爲，天下從此多事，民族的進化也不免要受重大的打擊了。

再從近代世界的大勢來說，智識發達的極軌，如果沒有道德爲之制裁，則一切聰明才智，都只足增加人類墮落的速率，而使之陷於萬劫不復之境。法人福格耶 (De Vogüé) 曾經說：

『如果我們一定要求和平，恐怕不出五十年，便要發現人類最腐敗

惡劣的徵象，其破壞的力量，比任何殘酷的戰爭爲大。」

這不啻是共產黨紅色恐怖的預言了！我常常想，如果世界上再產生幾個像威廉第二，史丹林，莫索里尼那樣的野心家，使赤白兩色帝國主義得以充分實現，然後各整旗鼓，決最後的雌雄，人類的末日，便不遠了。所以在生存競爭劇烈的世界，既因個人主義侵略主義的發展而造成罪惡和戰爭，自然不免有人對於智慧起了懷疑和反動，而『智慧萬惡論』也就應運而生。我們把這一點弄清楚了，然後進一步攷量救濟智慧墮落的方法。

研究人生哲學的人，都認定以理智控制慾望，乃人類向上的正軌。因爲一切文化，都含有強制的性質，最初野蠻人發現了社會義務的原則，而知以理智駕御行爲，才離畜生道而入人道。所以民族的文野，視其自制力之強弱爲標準。總理說：

『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性質。換句

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要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致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

在這一點上，胡展堂先生申明 總理的意思說：

『這段話，就認定人的獸性和人性都可以改造的；慾改造而成理性的進步，理性造就而求社會的人類的進步，這才是革命的教育的最高目的。』

這樣可見理智在人類行爲的調節上，實負有極大的使命。如果它忽視這種使命，或反而『爲虎作倀』，令慾望有所恃而無恐，便成罪惡與禍亂之源。所以單純的慾望，還不甚可惡，道德和法律都能夠制止他；只有慾望在智慧的掩護下橫決起來，那真是人羣進化的最大



障礙物！在這種情形之下，智慧愈高，其作惡的力量亦愈大。近來我聽人說：上海有大規模的綁票公司，主其事者多智識階級中人，他們因有敏銳的頭腦和豐富的才識，作犯罪的後盾，所以很不容易破獲。其實他們不過爲極卑劣的佔有慾所刦持，竟至犧牲自己的人格與社會的安寧而不顧——這便是智慧作慾望的工具之一例。推而言之，一切因自利心而賣却人格，千方百計，以求達其不正當目的者，也都可作如是觀。

大抵慾望愈強，則智慧之墮落亦愈易，在政治上也是一樣。歷觀古今才士，往往不得善終，其原因半在爲權謀主義所誤，遂視『親愛精誠』爲芻狗，後來弄巧反拙，無不歸於失敗。例如英國哲學家培根，總可以稱得『絕世聰明』四個字，其才智也很足以濟其惡。最初他向伊利沙伯女王求官，不恤負他平生唯一的恩人依雪司伯爵(Essex)，而置之死地；後來在傑克一世時，又背棄了布金漢公爵。結果

他因品行卑污，爲人所不齒，終受永遠監禁的判決了。其『迷而不反』，尤甚於我國之楊子雲。還有無數大奸巨猾，言足以飾非，行足以文過，道德不能制，法律不能禁，不過其結果決不會好的；吳稚暉先生所謂『畜生道上策士一流』，正對此輩而說！

凡是在政治上好『弄玄虛』(Play Politics)的，其病根在乎不明瞭政治生活所以維繫的基本原素，而自以爲可以智慧馳騁一切。殊不知智慧在政治上的地位，委實有限得很。華賴斯(Wallas)在他的『政治中的人性』一部書裏，開頭第一章就說：『在政治的立場上，不要把理智看得太大了。』他又揭破普通人理知萬能的迷信，因爲一個人往往以察察爲明，自恃認清了目的，看透了對象，並且已經有了達到目的的方法，可以不致變卦了；但是到了後來，往往是不如人意的多。這可以知道智慧的論理在羣衆運動上的失敗。在這一點上，黎朋說得好：『理智只能適用於科學及一切知識，惟有感情和信仰才

可以統治人民。」這話對於權謀自用的政客，不啻一個青天霹靂，他們把羣衆的行爲看得太機械了！

還有一個理由，可以證明智慧在任何政治上，萬萬不能佔太多的地位。我又要提起黎朋了。他的思想原是最富於保守色彩的；但是他論社會擾亂的原因，曾有幾段極警闢的話。他說：『聰明人不能過多，社會上全賴有受環境勢力裁制的平和緩進的民衆，以維持它存在所必須的安定性；不然，一定要釀成騷亂。……英國的好處，就在一般民衆都是中人，又是一定的性格，所以能爲世界最自由穩固之國。』他又說：『有許多可怕的政客，只知道以理智論理，隸屬於羣衆論理，用以辯飾其煽亂的行爲，這樣只能造成極大的騷動，對於文明的進步是毫無補益的。』

這樣看來，一個人放棄他的以理智抑制慾望的責任而聽其橫決，或是迷信理智萬能以爲作惡的工具的，在他自身和所屬的社會上，都要

起極壞的影響。如果政治上有這一類現象發生，那麼，其流毒所至，不是個人政治生命的中絕；便是團體行爲的崩潰，二者都是民族進化過程中所最當防止的可怕的病徵！

激

激

激

激

現在我綜括本章所說的，得下列的結論：

智慧有兩條不同的出路：第一，積極方面的發展，——以科學工業的創造和社會政治的建設爲代表。第二，消極方面的發展，——以自存本能下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的鬥爭及因此產生的一切手段爲代表。前者是人類進化的最大原動力，我們應當保持他，發展他；後者有時爲自衛和應付環境起見，也是人類生存所不可少的，如其純然爲利己的動機，而與其他個體或社會的正當利益衝突，那麼便是一種罪惡，我們在社會的民族立場上，應當竭力防止他，撲滅他。

這是下文一切討論的基點。



## 二 中國民族性的一個解剖

上面所述，已經證明智慧的墮落，足以破壞人類的進化，而使其全部生活陷於危機，一切無謂的爭鬥行爲亦因是以起。這種現象，不是單單的唯物史觀所能解釋，因為民族性中遺傳的精神的要素，也有釀成智慧墮落的素因在內。尤其在我們中國，歷史的潛力，常常支配一般人的思想和行爲。質言之，中國的歷史便是一部內爭或相斫的歷史；三千年來，幾於無時無地不爲『成王敗寇』的定例所支配。而人民的心思才力，一面因專制君主的愚民政策的禁制；一面又因歷代聖賢的處世哲學的倡導，潛移默化，遂相率趨於陰柔沉鬱之一途；其於物質文明的貢獻，簡直微乎其微。這是研究民族史者所最不能忘記的一件事。

中國人智慧的消極方面的發展，往往有爲西洋政治家所『望塵莫及

』的。總理說：『用民族的性格證明，中國人實在是比外國人優，弄得現在國勢像這樣的衰微，自然不能不歸咎於我們的墮落。』這所謂墮落，便是：智慧忘却它制裁一切欲望感情的責任，反而『助桀爲虐』，替人類原始的獸性『保鏢』，使它得以任意猖獗起來。我從各方面觀察，覺得中國人的殺機，簡直遠出任何國家之上。外人誇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也常以此自負，細想起來，真令人羞慚無地。什麼愛好和平，不過妥協性重些，貪圖苟安，好逸惡勞罷了。實則極強烈的自利隱機，仍在下意識中潛伏着，到處尋覓出路。這種隱機，是智慧在幾千年來禮教的面具和宗法社會的壓迫底下消極發展的總結晶；馴至於日常行爲，在在爲內心的潛力所支配，雖力求物質環境的改善，亦不能使他消歇或變更方向。總而言之，中國人心理的病態，已是根深蒂固了。

不過這種心理的病態，既爲數千年歷史所累積而成，我們尋根究底

，就不能不揭破它的秘密，雖因此而遭『名教中人』之抨擊唾罵，也是無所顧忌的！

歷代帝王的愚民政策，足以促成人民智慧的橫決，其理甚明，不必說了；至於中國聖賢的處世哲學怎麼說是智慧墮落的誘因呢？這個是一言難盡，我們從民族進化的縱斷面看來，中國人思想的支配者——除『舶來』的不算——以儒道墨爲三大權威。而這三家思想，根本上就都有上述的危險性！且聽我慢慢道來：

第一，儒家的人生哲學，以功利爲目的，而以倫理爲手段。孔子自己便是一個最熱中的人，他一面教人以仁孝忠恕；一面口頭說的，却是後世流行的『兼善』其名而『獨善』其實的做官主義的濫觴，使自利慾望和權術思想得有極優裕的迴旋之地。他說過『學也祿在其中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學而優則仕』，『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而成』這一類熱中的話，叫大家求知的熱度，以



達到功利的目的爲止，而將其剩餘的心思才力，另在政治社會上找一條出路。孔子自以爲有了『仁』和『禮』兩個法寶，所以制服人慾而無虞了；殊不知你既把他的功利思想煽動，則他從政之後，便拿你的倫理思想作招牌，仗着學問上沒有發洩的智慧，幹他自己的勾當。

因此之故，『爲貧而仕』而同時能夠『兼善天下』者，數千年來，只有循吏傳中寥寥幾人而已！『祿利之途』簡直是罪惡的淵藪，這是班孟堅也看到了。儒家口中的道德，到了後世，就漸漸變成『筌蹄』，這是孔子思想上不澈底的流毒。所以我以爲孔子是機心最重的，孟子雖然豪放些，總不免才智自用，有縱橫家的氣味。或許是亂世的環境有以致之罷！

儒家之學，最斤斤於王霸之分。其所謂『王道』，就是德治主義；與當日講求富強的霸術，以法治爲原則者，針鋒相對。他們也知『欲』之難制，故圖以禮化之。荀子在這一點上說得最透闢：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欲，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篇

荀子明瞭人性的根本質素，所以大膽的主張性惡論，並且說：『禮生於僞』，大爲後儒所攻擊。其實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程伊川也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這簡直是替荀子張目了！

降及後世，儒術雖漸發達，而其一脈相傳的窒慾主義，因功利思想的誘惑，却造成了許多僞君子。韓愈所津津稱道的楊子雲，便是這種觀念產生出來的。唐宋以後，理學大昌，僞君子也愈見其多。推其受病所在，實由於沒有『超功利』的思想，一經從政，便不得不參些權謀作用，漸把天機瀉盡了。這正如程伊川說的：『閱機事既

久，機心必生』，非上智下愚，殆難出此境界！所以後儒之自命入道愈深者，其機心亦愈重，我舉幾個人作例罷：陸稼書是一個理學名儒，他說：『做人須留正經七分，略裝聾作啞假癡呆一二分』，這簡直更是教人作僞了。（不是荀子『化性起僞』的僞，是虛假應物的僞。）還有一個邵二泉，他有兩句名言：『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無窮受用。』這句話在表面上似乎是涵養工夫到了家，其實他既覺得有『無窮意味』，便是機權思想的萌芽，不可爲訓了。曾滌生根柢比較的醇厚，但是他也不免有些霸氣，常常流露於字裏行間。我不暇一一列舉了，只看他說的：『無時不謀，無事不謀』一句話，便曉得是深心人的行徑。總之，儒家的修養工夫，因圖以理窒欲，而不知所以遂之，結果理反爲欲所乘，而桀驁不羈，才智自用者，更有所假籍。所以到了後來，社會上對於理學家的信仰，就一落千丈了。

第二，怎麼說道家有促成智慧墮落的傾向呢？史記上陳平說的『吾以陰謀，爲道家所戒』，不是道家反對權謀主義的鐵證麼？這個我們該分辨一下，先說老子。老子主自然，其實他是最不自然的一個人。他平生巧於用智，爲後世縱橫刑名諸家的鼻祖。由他『大智若愚』的思想造成了許多僞君子；由他『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手段，造成了兵法上實實虛虛的原則，所以後世大奸巨慝，殆無不得力於老子！他既教人以用智之法，同時又以『絕聖棄智』爲尙，這顯出他的矛盾。究其缺點，在不明智慧有正負兩方面的發展；竟至以偏概全，而認智慧爲罪惡之源。他不想怎樣把智慧的作用提高，而單想根本把他消滅或把他隱藏，所以橫決之禍，終不可免。而他自己權術的隱機，也常常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他說：『智慧出，有大僞』，老實說；若像他這樣一面提倡違反人性的無爲主義，一面又處處以治天下之道教人，恐其反動力之所至，非叫人人變成大僞不止！

莊子跟着老子『絕聖棄智』之說，以『跼蹐好知』爲戒。但是他仍不能忘情於智術，所以一則曰『莫若以明』；再則曰『以恬養智』；三則曰『達於理必明於權』，到底還是很積極的入世思想。有人說：道家是陰謀家的鼻祖，恐怕我們不容易反駁他罷。

第三，要說到墨家了。墨子自己，確可以稱得苦行君子。他的真氣，也要比孔孟老莊深厚一點。他以爲一切禍亂之源，皆起於人類的不相愛，於是倡『兼愛』與『非攻』之說，以消弭鬥爭；同時他更想『以戰止戰』，乃教人以守禦的本領，這些都是亂世無可奈何的辦法。不過他對於個人的修養，未免屬望太高，制限太嚴了。如他的主張，一個人定要做到『摩頂放踵』，『胼無胝脛無毛』的地步，此豈可望之於人人？尤其是他的絕慾思想，——『爲其所難，不爲其所欲』——更令後世視『兼愛』爲畏途，而楊朱的爲我主義，反得浸淫於人們的心裏。大抵禁制愈重，則反動力亦愈烈，這是他不明人性所致

，後世利他主義的消熄，未始不是墨子主張太極端之故呵。

上面所說，或許有人以為責備太過，失忠厚之道，這却不然。儒道墨三家的真義，如日月中天，萬古不廢，不過其中有些毛病，大家都視若無覩，長此以往，未免遺患後世。所以我們既然發現了，便忍不住說了出來，作國人的鑒戒。我因儒家思想入人心最深，所以也說得較詳；對於墨子多恕辭，亦以此故。

除此以外，民族的遺傳性中，更有些顯著的病根，值得注意的。

記得英人斯密司(Smith)著了一本中國人的特徵(Chinese Characteristics)說：『中國人是頗有些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這話使我想到了戲劇小說在中國人心中支配力之大。我常常覺得我們中國人有兩種最普遍的崇拜心理：一種是英雄崇拜；一種是——我無以名之，名之曰『軍師崇拜』。兩者大半由稗官野史而來，雖然其中也有受歷史人物的影響，然總不及小說戲劇魔力之普遍

。前者不必說了；就後者而言，中國人所最喜歡的小說舊劇，至少是要裏面有幾個拿羽毛扇的軍師，在那裏出花樣。三國水滸之受一般民衆的鑒賞，也是孔明司馬懿吳用的魔力所致。所以每逢看戲，拿羽毛扇穿八卦衣的出場，大家便聚精會神，伸長了頸子準備喝采。或是在小說裏，看到有『如此如此』，『略施小計』一類的話，興致也倍增了。這種心理的結果，便是社會上拿羽毛扇的日見其多！上焉者爲政客策士；下焉者就成了土棍訟師。這些人大都是游離分子，無恆業亦無恆心；只會消費，不會生產，對於學術政治等等的積極貢獻更是沒有；但在社會上却佔相當的位置，生活也不致有匱乏之虞。於是一般才智自用的青年，見有捷徑可抄，便放着正經的學問專業不做，拚命的往那裏跑，因此中國這一類的人才特別的多，而社會安寧遂無時不在動搖之中了。推其原故，就是這種謬見造成的。

智慧的鬥爭，本來是人類的通性——而尤以青年期爲甚。屈雷西

在他的一部心理學裏說：『青年是慾望最強烈的時代，喜歡一切有刺激性的東西，所以淡泊寧靜的精神上的養料，他是不需要的，……他最高興聽種種關於陰謀的故事，並且去模倣他。』這種心理，如其沒有理性的裁制，而綿延下去，結果便足以擾亂社會安寧而有餘，倘使再遺傳到後世，民族的進化，自然也要大受影響了。

鬥智的流毒，充其量便是把人生看作戰場，一味以『兵法』待人。於是更由『兵不厭詐』的原則產生了權謀主義；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原則，產生了『逆億』主義。馴至待人接物，無往而不以智術相迎拒，把寶貴的時間精神作了犧牲，終不肯揭露自己的真面目。這是中國人『鬥智』的通性。大抵越是亂世，越喜歡鬥智，因為心思才力，不肯向正當的方向發展，而專以壓服人家爲能。但其在文化上的損失也就很可觀了！試想戰國比成康怎麼樣？三國比文景怎麼樣？不是聰明愈誤用，世局愈亂的鐵證麼？



有人說：中國人是善於打算盤的民族。但其吃虧處在乎只會打短命算盤，不會打長命算盤。換言之，就是只能見其小者近者，而昧於大者遠者。譬如孟子『三不朽』的思想，是很嚴正的了；但它所提到的『德』『言』『功』三者，所謂功，便是指政治社會上的動績而言，却把人類進化最重要的動力『物質建設』忘了！這個本不足怪，中國人向來把天算工藝醫藥之學，看作太祝匠人術士的專門職業，而『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又是末藝小道，『名教中人』是不許插足的。大家更那裏想到：在這些『小道』裏面，會產生哥伯尼的地圓說，安斯坦的相對論，瓦特的汽機，巴斯德的微生物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而使人類生活，全部震動了呢？所以每逢鼎革之後，亂事初定，一般所謂經天緯地的人才，往往只能爲一家一姓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對於民生和學術，反而忽視。上焉者也不過啣唔咕嚕，想出一些精神文明，作茶餘酒後的談助。因此，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精神能

力，竟生生斷送在智慧的近視和墮落上面！其實我們的智慧，確比其他民族爲優。其受病之最大原因，便而走錯了方向，而入於權謀主義之一途，以致於反替欲望和感情張目，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呵！

現在我們似乎有些覺悟了。在這機關鎗對打的世界，光弄玄虛，沒有實際本領爲後盾是不成的。青年們的心思才力，漸漸能夠向遠大方面發展，而知科學工業政治社會的真學問爲人類進化的正軌。這種覺心是中華民族前途的曙光。我並不是說，青年們一定要個個拋棄了政治的生活，到學問的路上去。不過其參加政治，應當有極純正的爲民族謀福利的動機，不可爲利己欲望所玩弄，而墮入魔道；尤其是在革命的立場上，首先要剷除權謀自用的思想，和『睚眦必報』的惡意。這是我們人格向上的起點；也是民族光明的發軔。同志們，猛醒呵！



## 二 策略與主義

歷史上的權謀主義和共產黨的策略思想交流的結果，使一部分歧路的青年，憧憬於理慾交戰情態之下，而不知所決。這重陰影，經過外界的種種誘惑，逐漸形成民族前途的危機；但是我深信這個危機不久便可消熄，只要我們青年能夠養成堅定的識力，和瑩澈的心境。

從上面幾節，讀者當已明瞭智慧的正當出路，和革命青年所應取的方向了；現在要進一步研究『策略』在革命運動中，到底佔什麼地位。

我們既知任何有意識的行爲，都有其目的與方法，在神聖偉大的革命事業中，自有運用相當策略之必要。不過我們的策略乃純然以主義爲目的。質言之，在民族的立場上，我們對於自身的敵人，爲謀全民的幸福利益計，當然要採奮鬥的形式推倒他，使主義得以實現；不然，反動勢力便會來壓迫我們，直到中華民族根本衰落才罷。因

此之故，我們的革命工作纔是最有意義的民族生存運動。而革命本身，便是以求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爲目的之唯一手段！我們在此過程中所取的一切手段和政策，都要以上述的動機爲指歸；最要緊的，便是總理遺囑所云『喚起民衆』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兩條大路——這樣才是最正大光明的革命手段。我們謂之『方略』也可；謂之『策略』亦無不可！

不過自從共產黨橫行以來，『策略』一語，已被他們用得卑污不堪了。無論何人，一聽到『策略』二字，馬上要打個寒噤，好像它是一切搗亂破壞的手段的代名詞，至少是與陰謀有關的。我們如要洗滌他的污點，或是用『正名』工夫追尋『策』和『略』兩個字的原義，都不免有人要說你『勞而無功』。我們就依一般人心目中『策略』的印象，而解作含有消極意義的革命手段，並且單是對付敵人用的，那大概沒有什麼多大的謬誤罷。

主義與策略的區別，本來很明顯的。但自經過共產黨鬼混之後，大家似乎又糊塗起來了。共產黨是只講究手段的，所以竟有人受了催眠，以為革命便是北伐；甚且說什麼『三大政策』是革命的目的，這些可怪的誤解，都在不明二者的分別所致。現在簡單的說明一下：就是主義以『常』為原則，有中心主張而求其達之之道；策略以『變』為原則，有時無所謂主張，只要達到自己的目的，甚至雖放棄其所標榜的學說而認敵為友，亦所不顧。所以在這種謬誤觀念之下，每『變』一次，民衆的苦厄亦隨之增加一次。像上次張黃佯追賀葉，荼毒廣東無辜的人民，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現在確乎有人顛倒於共產黨策略之高妙（？），而悠然神往的。尤其是富于好奇心與變動性的青年，往往因外界的誘惑，舍正路而弗由，以致為共產黨策略萬能的病菌所乘，這是最可憂慮的。近來我們從各方面看到的共產黨宣傳品和秘密文件裏，已經明瞭他們這些叛徒

早拋開了原始的馬克思主義，而以玩策略爲唯一特長，同時用各種煽動手段，來吸引那些血氣未定的青年，生生跳進『策略』的陷阱中去。其實他們的策略，完全是抄襲歷史上政客官僚強盜土匪的老法子，不過多了一副主義的面具而已，大家別上他的當！現在試把它歸納起來，我們更可明瞭：共產黨並無主義，他們的真主義，只有三個：

第一是工具主義 共產黨的工具主義，與上章所說的杜威一派文人學士所倡導的又是不同，因爲共產黨是單對『人』而施的。他們要想達到主觀的卑劣的目的，但又爲客觀的事實所不容，所以不得不採取最狠毒的戰略——一種鎔冶政客痞子地棍訟師強盜土匪於一爐的戰略。由他們的戰略看來，什麼人都是工具，要的時候來利用你；不要的時候馬上把你丟開。可憐有許多聰明人竟因此活活的上了圈套！

第二是招牌主義 共產黨因要利用人家，不得不用欺騙的手段，在他們的戲法底下，主義只是一塊招牌；又可以說像是一張永不兌現的

支票，只好拿去騙騙瞎子。吳稚暉同志說：『何以辨其爲共產黨人，即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真話；第二以能騙人爲第一種道德。』他們欺騙人也有一定的程序的，劉蘆隱同志說：『他們的方法只是，第一步借列寧主義去騙取國民黨做幌子；第二步，借國民黨招牌去騙取戴左派高帽的人做幌子；第三步，借戴左派高帽的人去騙取汪精衛徐謙這一流人做幌子；第四步，借了這種種幌子，才騙到一些民衆。』的確，『招牌主義』乃是共產黨自命最得意的一種拿手秘訣！

第三是縱慾主義 共產黨之所以猖獗，就在他們善於利用人類的獸性，聽他橫行。他們利用支配慾去『取得』所謂農工運動的領導權；利用佔有慾去榨取農工的血汗以自肥；利用性慾去實行『性交自由』；利用名譽慾去騙人戴紙帽子遊街，凡此種種，無一不以獸性爲出發點，亦以獸性爲歸宿點。這一層胡展堂先生已經講得極透闢了。從另一方面說，他們無論什麼事，都要做得自己痛快；所以殺人放火



以及一切硬幹的手段，都說得出，做得到。他們因要硬幹，所以人類應有同情和互助心，一概撇在茅廁裏。且看他們的首領布哈林說：『勞動者對於有產階級，只有一種義務，就是要推倒他，直到他不能動彈爲止。』汪精衛也有一句名言，『對敵人慈悲，就是對同志殘忍，』都是根本不要同情心的表示。我們真不能已於言了：固然資商家應該打倒，但以衰頹的中國實業，這樣無辦法的硬幹，非到工業根本衰歇，大家關門不止。現在中國共產黨要把俄國的梅毒針，注到中國人的血管裏，如果及今不除，恐將來必有全身腐爛之一日！總之，他們簡直是要把原始的獸性，發個十足。有人說，他們的方法，乃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和黃巢李自成的殺人主義的總結晶，於古今中外的民族劣根性，兼而有之，無怪其貽禍之酷了。

除此以外，他們更無所謂主義了。共產黨的破壞手段，到了最近，已臻人類智術墮落之極軌；一切人間最卑污最辣毒的策略，都在他

們的行動裏充分暴露出來。吳稚暉同志說他們是『亂世降下來的惡魔』；他們的革命是『在叫化子身上打出冷飯團的革命』，真正一點不錯。因為他們並無確實的主義，只要紅色恐怖成功，少數痞棍能夠『專政』，什麼都可以的。所以列寧的策略，可以『退守』，可以『與敵人合作』，只要達到目的。他們最得意的一句話，就是『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爲道德。』我們回頭想想：如果作惡都會成功，那麼我們弱者便早已絕跡於世界，共產黨一定也可以得意無疑。然而事實上恐怕不盡然吧，近來我嘗聽人說：共產黨的策略這樣很毒；國民黨又太忠厚，恐怕總有一天要被共產黨戰敗的，這種見解，未免太可笑了。歷史告訴我們，凡以權術服人者，其事速而易敗；惟以主義化人者，其事乃緩而可久。這話或者有人要以爲迂闊，待我再來申明一下：大概好用策略的人，根本對人就沒有半點誠意。所以他們的利用和欺騙，都只能得意一時，遲早總要露出破綻的。他們不知道政治

的永久生命在乎信仰；却處處以賺人上當爲得計。在這一點上，就可以證明共產黨萬萬不會成功！

反之，一種偉大的主義，其產生之初，每要受反對者的破壞和攻擊，所以其在當時往往有被壓迫的傾向，但是只要眼光遠些，無不獲得最後的永久的勝利。就拿宗教來說：耶穌最初的信徒，只有十二人，而且還爲猶大所賣；穆罕默德之興，也不過四十人。其後教義所播，漸及下層，所以耶穌的信徒，全世界竟達四百九十四兆之多；穆罕默德勢力所及，亦奄有亞洲西部，波及南歐。試想宗教的魔力尙且如此，今後文化日進，智慧日開，則以純正偉大的三民主義，和已有百萬信徒的國民黨，那有不深入人心之理呢？就如總理生前，無人笑他太不肯用手段；其實他豈是不能，竟是不屑罷了！到了今日，總理的人格和精神，誰不欽敬？較之列寧之以手腕毒辣，爲世人笑罵，只落得一個『狠』字的致語者，又孰得孰失呢？所以有主

義雖不尚策略亦勝；無主義雖有巧妙策略亦敗，這可以說是萬古不磨的公理了。

更從歷史上看看：一切暴動手段，後來又作怎樣的結局：黃巢張獻忠一班流寇，不必提他；就如當日法國革命的時候，山岳黨總可謂『極一時之盛』了。這班黨人，以極兇酷的手段，破壞一切，殺人如麻，簡直可與今日的共產黨後先輝映。但不到幾年，這些黨徒，一個個延首就戮。所以歷史家說：

『法國革命，山岳黨之所以猖獗者，其目的不過在取得政權，而惜革命作一種策略而已。所以他們的革命都是因個人的利害，而把國家的安危來作犧牲。』

從此可見，有個人而無國家的強盜式的暴動手段，終不過曇花一現而已！我再來說一句迂話罷：從前『王道』與『霸術』之分，便在前者是『天下爲公』，而後者只知利己，置他人於不顧。這可以拿

三民主義和國家主義來對照，其實二者還不能說是絕然相反的。至於共產匪徒，不過是吳稚暉先生說的『殺人放火教』，只好與黃巢張獻忠白狼孫美瑤並駕齊驅，其去霸術也還有十萬里之遠！

我們要知道，一個黨如其失了民衆的信心，便永遠不會成功。試看像一年來兩湖人民所受的慘劫，和廣東的兩次變亂，一般人聽到『共產黨』三個字，誰不毛髮直豎？現在我們既已『堅壁清野』，歐洲亦貼出『謹防扒手』的警告。姬采林雖利害，也弄得落荒而走。他們自己又一年到頭，鬧着內爭。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策略的結果，便是『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莫司科火車站待合室的內外』，成績也很可觀了。所以儘管他們破壞的本領高強，總有惡貫滿盈之一日，我們正不必過慮。所可怕者，乃是我們同志不爭氣，學了一些玄虛，便把主義丟在腦後，那倒是本黨前途最大的危機，我認爲有根本消弭的必要。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考慮，到底怎麼可以消弭『權術主義』的隱憂呢？簡單一句話，便是以我們 總理的言行作準繩！

總理生平以『親愛精誠』待人，所以最看不起權術。他屢次上了人家的當，也絲毫不記在心裏，像那樣寬大的胸襟，後進同志能夠學得到的，已絕無僅有了！不但如此，總理一生，只把破壞當作革命的暫時手段，其目的完全在積極方面的建設。他曾說過一段很沉痛的話：

『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如帝統爲之斬絕，專制爲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壞，不可無非常之建設。是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也。惟民國開創以來，既經非常之破壞，又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此所以禍亂相尋，江河日下，武人專橫，政客搗亂，而無法收拾也。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

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

由此可知總理所說的『方略』，是單指含有積極意義的建設計劃和政策而言；譬如爲實現民生主義，而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展實業種種方法；又因爲適應革命各時期的積極設施，而釐定『建國大綱』，使後人知所遵循。這個又豈是以殺人放火造成紅色恐怖爲唯一手段的列寧黨徒所夢想得到的？不幸自總理歿後，黨內分子逐漸染了壞脾氣，利令智昏，往往墮入魔道；甚且流於歷來軍閥政客劣紳痞棍使詐用術之一途。上行下效，正氣蕩然。我早說過，這一半是共產黨的流毒未淨所致；此後非打清血針，把這種壞念改一改，簡直不配稱爲 總理的信徒！然而風靡草掩，更令我們從何處下手呢？從前陳英士寄給黃克強的信裏，有幾句話，真不啻爲目下的黨風寫照：

『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徵膨脹。而自精神上

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復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尸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必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之苦心否耶？」

這封信還是民國四年春天寫的；不知同志們讀了他後面的幾句話，也覺得有些痛心麼？

上面所說，並不是題外橫生的枝節，而爲本黨同志所應當積極注意的。我所以絮聒如此者，實在因爲同志們太不把 總理的遺教放在心裏，而一味獨行其是。我敢於說，現在有些人雖是開口 總理閉口 總理，大有自今以後，『舍我其誰』之概，推其居心，恐不過是拿 總理做幌子；去騙取一部分民衆（？），作發展野心的工具而已。這話固是太刻薄了一些，然而就我所見，確有些野心家以此爲最



得意的策略的，黨紀日壞，亦無怪其然。最近吳稚暉先生舌敵唇焦，力言權謀之爲害；並且主張從速建設『賢明政府』，化除機詐，以總理的言行爲法，共同擔起國民革命的責任，這確是救黨的不二法門。我因此想到羅素的一句話：

『賢明的政治，是要減弱其對內的有武力傾向的種種衝動，而在下面兩個過程中進展：第一，爲創造的衝動增加機會，並用教育的方法，增強這類衝動；第二，減少佔有本能的出路。』

照此引申起來，可以說：

第一，爲增加創造衝動，我希望大家把智慧向積極的建設方面發展，最低限度是要能夠發揮 總理的『物質建設』和『心理建設』的真精神，以求主義的澈底實現。

第二，爲減少佔有衝動，我希望大家要運用理智力，來制御一切原於地盤，勢力，利益的思想的佔有行爲，最低限度要明瞭公私義利之

界，以期策略之歸於正軌。

這樣，國民黨這個嬰兒纔會從荆棘榛蕪的歧路，走上平坦康莊的大道；一切卑鄙齷齪的權謀思想，更不會來賊害我們了。



## 四 怎樣做革命領袖

爲什麼我要提出這樣『大而無當』的題目呢？

我覺得中國人有一種普遍的脾氣；學人家的好處是要『適可而止』的；如果人家——尤其是偉人們——做了壞事，那麼，『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的觀念，便躍然而生，非學他一個淋漓盡致不快！就我們黨裏而言，近來流行的種種惡習，恐怕領袖們至少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吧。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現在要轉移黨風，也就在這『一二人』身上！如其做領袖的人，不能『砥礪廉隅』，爲天下表率，或反而鬼鬼祟祟，效奸雄策士之所爲，那麼，不但可以斷送它自己的政治生命，並且足使黨國前途，陷於萬劫不復之境，這是最令人思之危慄的！

自 總理歿後，革命工作久已感到無人領導的苦痛；在黨的基礎未

臻穩固之先，軍事的勝利是不可恃的。固然，我們是以全民革命爲目的的黨。黨的內外，不許有任何特權階級的存在；不過爲革命運動的便利與集中起見，應該有素爲黨內同志與黨外民衆所熱誠信仰的相當人物，從中主持，使工作有所遵循，人心有所歸向。在黨員和民衆的立場上，常常不免抱這種觀念，我認爲是應該有的；不過在我們領袖自己，却要明瞭本身的使命和地位，萬不能因此而入於逞強恃勢驕奢淫佚之一途。因爲黨的本身是看不見的，民衆信心的消長，往往與領袖們的態度行爲有絕大關係。我下面的話，乃是站在黨員的地位上，向我們忠實的革命領袖，貢其一得之愚；至于我的言辭，能否發生一些最低限度的力量，足使領袖們惕然心動，那只好聽大家的自覺罷了。

第一，今後黨中的領袖，如要想革命成功，簡單的說，除以總理爲師表來努力創造自己和民族的新生命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這話怎麼講呢？ 吳稚暉先生曾經說：『中山先生最偉大之處有三：公私分得清；責任拿得起；仇恨忘得快。』 我敢申明吳先生的意思：『公私分得清』便是『智』；『仇恨忘得快』便是『仁』；『責任拿得起』便是『勇』！ 智仁勇三者乃是做革命領袖的基本美德，缺一不可！ 歷史上所謂英雄，大抵智勇是有的，所差者是一個『仁』字；而邪正之分，便在於此。 如其再連『勇』字都沒有；單知道德意別人去衝突，那充其量只配做徐世昌，段祺瑞一流，我們革命隊伍裏用不着這樣的角色！

可是我個人所見，有些領袖似乎仍不脫權謀主義的迷夢，這是很可憂的一種現象，我們不能不盡力來勸醒他們。 放眼一看，古今智術自用的梟雄，善始善終者簡直沒有幾個！ 大抵越是才人，越難跳出霸術的關頭，因為他太勇於自信，視天下事如反覆手；到了後來，一生的功業威名，却被才智的繭牢牢困住，盡付東流了。 想到這裏，

吾不禁爲天下才人惜，又不禁爲本黨同志危！

歷史上的物人不必提了，民國以來，神奸巨猾，當以袁世凱爲首屈一指。他從小站練兵起，直到做了總統，謀慮不可謂不遠。不過他一生迷於私慾，常不免倒行逆施，當日帝制自爲的時候，各方勸進文電，雪片似的飛來，真所謂『一世之雄』。但是衆怒終不可犯，弄到結局，衆叛親離，就是他一手提拔的陳宦劉顯世，也倒戈相向了；只有一個龍濟光，不識死活，還替他撐硬腰。畢竟大勢已去，無所挽回，這一個蓋世的梟雄，便活活的忿恚而死。

還有法國革命之初，羅伯斯比爾真是威風煊赫，炙手可熱了。他秉政之後，把一班異己，誅鋤殆盡，自以爲可高枕無憂，大權獨攬。當日的國民公會，國防委員和特別委員，他都『頤指氣使』，誰敢說半個『不』字！但是結果怎樣呢？自從他頒布幾條頂利害的法令，以法蘭西的迭克推多自命以後，便激起羣衆的公憤，生生的把他送

上斷頭台。這就是一世奸雄的結局！當他盛時，何嘗不以領袖自居，目空一世，但終於不免一死。所以法國歷史家台奴批評他是一個『愚而自用』的人，真是最確切的考語！還有人說，羅伯斯比爾所以致死，因他手段太狠，度量太狹，以致自取敗亡。在這一點上，黎朋說得最好：『甲古班的心理，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容忍。這種不能容忍的心理，不但黨中領袖如此，黨員也是如此；不但用之於在野時，而且用之於在朝時。』從此看來，古代君主之猜忌剛愎，與西洋革命首領的恣肆專橫，恰成一個對照，然而結局也差不多的，就是好的很少。我盼望負民衆重望，高自期許的本黨領袖，再不要追步他們的後塵了！

我們更要知道，近世的革命領袖，真無人可與總理媲美的——列寧之陰狠，凱末爾之專擅，柴魯爾（埃及革命領袖）之剛愎，都有所短，我們所希望的領袖，並不要這樣。我們只需要有覺心有毅力有德



操的領袖，來引導神聖偉大的革命運動。黨中先覺，有肯繼繩總  
理遺志，爲民請命的麼？我真的要『夢寐以求之，徬徨以覓之』呢！  
其次，一個領袖對於自己所信受奉行的主義，自然要有明確的認識  
；所以本黨領袖，對於總理遺教，便應該悉心體會，一切舉措，都  
以此爲出發點。我以爲領袖要有一定的主見，却不可挾成見。主  
見是理性的我；而成見是感情的我。古今領袖，往往個性太強，總  
不肯犧牲成見來適應環境。譬如列寧，就是犯了不可救藥的主觀病  
的代表人物。反之，也有一種人，具有很重的妥協性，往往今是而  
昨非，朝仇而夕友，其主張態度，全視利害感情爲從違，別的一概不  
管。如即使這樣的人來領導革命，一定也要發生許多危機。英國  
政治家格蘭斯頓(Gladson)，曾在一八六八年著了一部書，裏面說：  
『一個羣衆觀瞻所繫的人物，若突然將意見變遷，其遺害所及，  
雖較固執的謬見爲小，對於國家也有很大的影響。』

這正因為領袖的態度和主張的動搖，足以釀成全部局勢的動搖之故。華賴斯 (Wallis) 也說：『為政治家者，不獨於自己論斷的變遷，非常矜慎；而且關於所考慮而將要發表的問題，除已經成熟，可以立即實行的以外，每每暫時擱置，以防將來的懊悔。』不但政治如此，別的事業也是一樣。譬如價值值的報紙，他的主張要前後一致，才能博得讀者的歡迎。所以無論何時，民衆的信心，必定建築於領袖的『一貫』的人格之上。如果反其道而行，任情變更，恐怕只足自召覆亡而已！

就拿個人的利害來說，政治上的勝利，全在能夠以理性控制自己游移不定的見解。不過在事實上，一個領袖的態度的突變，往往由野心和感情而起，在其動因未除之先，理性的自制每難於奏效。蒲魯葉 (Bruyere) 有一句名言：『聖哲能以更大的野心來克制野心，他從財產命運等等的圈子裏，救出自己。』這更大的野心，最主要的就是中

國歷來稱道的『不朽』思想。因為偉大的領袖常常能夠下『快刀斬亂麻』的決心，去造成它永久的生命，這正是我們革命領袖所應當取法的。

復次，我深深感到；中國在五十年內，恐不能脫英雄思想的支配，因為民族心理上的根株已植得很深，實在難以猝拔。然若黨內領袖能本 總理的詔示，努力於『先知先覺』者所應盡的職分；縱使參些英雄思想，我覺得還沒有多大的弊害；最可怕的，就是效法歷史上一切英雄所以致敗的行徑，驕奢淫佚，好大喜功，自以為威望冠時，可以無後顧之憂了。但是威望能否長保，要看人格的升降為轉移。黎朋說：『所謂威望，不是基於個人的權力，赫耀的武功和宗教的騷動；其最有力的元素，乃在『敬』和『慎』兩個字。』他又說：『雖以萬人崇拜的英雄，一旦失足，就要『羣起而攻之』了。常人失敗，還不要緊，如其鼎鼎大名的人，忽而墜落，則侮辱之者必更甚。』

這些都是我們最好的鑒戒。

話雖如此，一個人到了『物欲鑠於外，客氣賊於內』的時候，往往不能自持；這就要看他的涵養了。我常常說，革命家要注意進德工夫，尤其是領袖們應當如此。但是竟有人認修養爲消磨志氣的，這簡直是不可救藥的謬見！我所謂修養，並不是希望大家走入陰柔一路，我也知道，中國的舊道德未免太偏於『靜』的方面，一定要參合近代道德的新潮流，才不致發生流弊。在這一點上，總理真是我們唯一的楷模。他一生言行，具有中外古今道德之長，所以無往而不自得。可是我們太不爭氣，竭力求勝過總理，結果反而走入歧途，這更是要痛改的！要之，總理人格上的成功，不但今後領袖們應當取法，本黨全部同志都不可出此範圍，也不能出此範圍。現在領袖們所犯的毛病，正被吳先生輕輕點破了。我覺得革命的過程中，爲害最烈的，莫過於「以私誤公」和「睚眦必報」兩件事。在

這一點上，朱晦庵有幾句很沉痛的話：

『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賊夫義，情有所蔽，是以憧憧。不知自反以去其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心勞日拙耳！』

還有一點，近來後方同志，似乎有些「得意忘形」了。他們的生括，逐漸呈享樂主義的傾向。所以有人說；江浙真是一塊壞地方，我們革命健兒，從前多麼奮勇，多麼刻苦？一到了江南，便多少染了些他們的習氣了。記得三國演義上，劉玄德到荊州入贅，一班將士就『紙醉金迷』起來，趙雲看不過，星夜要班師回蜀；辛虧劉玄德天機未昧，猜破了美人計，才設計離開荊州。如果遲一步覺悟，後事真不堪設想了。這段故事，可見享樂主義是萬萬要不得的，它能使人陷溺，使人沉迷。只看古今多少才人，喪節敗行，都在一個「豫」字上面，我們同志那可不要省呢——話越說越遠了。這些都確

乎有些腐氣，或者有人聽了不耐煩，我再兜轉頭來說幾句話！

我們的革命，既以救民疾苦爲目的，所以無論領袖也好，小同志也好，在日常生活上，當然要力求「平民化。」試想北方民衆，久困於軍閥土匪兩重淫威之下，求生不得，怎能不惻然於懷？尤其是嚴冬時節，風雪載途，前敵將士，胼手胝足，效命沙場，又是多麼的慘痛？若猶華屋深居，姬妾羅列，何以服人心而對黨國？我們的黨素以平等主義化人，領袖們尤當以身作則，萬不能效從前「英雄」的浪漫行徑——這一點意思，同志們當早已領悟；我爲此言，亦望大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

其他關於革命領袖所當取法的言論，黎朋在他的許多著作裏，說得非常詳盡，我不暇重述。現在只引戈文 (Gowin) 的『首領論』中的幾句話，作個結束：

『人要有高尚的人格，然後待人接物，乃覺藹然可親。否則窮工

極巧，也不過手段的變化，決不能持久的。」

## 五 國民革命的一線生機——心理的建設

關於本文所應討論的中心問題，到此已是『百川歸海』的時候了。除第五章外，其他各章，似乎『破』義多而『立』義少。然而建設方面的一切主張，總理集中已全盤說出，我們對於這樣崇高豐富的遺產，只有頂禮，只有奉行，那能復贊一辭呢！

總理生前，早已料到了後輩的病態，所以他無論在著述裏，或是演講裏，莫不諄諄以完成人格爲言。他固已知道定有不肖分子，要使『偷樑換柱』的伎倆，借主義爲招牌，爲目的不擇手段，去發展自己野心的了。現在這班野心家的西洋鏡逐漸拆穿，雖目下似乎還能得意洋洋，或夫唱婦隨，優遊海外，久後終不免要歸於淘汰；可是黨的元氣的恢復，却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們退一步想，在革命未完成之前，物質建設的工作，既難全部成功；爲免除黨國前途的糾紛起見，



最好能有人根據 總理全部遺教，紬繹其中關於心理建設的種種精義，以補於『知難行易』說之後。這一步工作，也是過渡時期所不可少的。我相信黨內曾經親炙過 總理的先進同志，一定能給我們以心靈的無上的安慰！

近來從複雜奇幻的環境裏，我無意中却學到了兩個乖，就是：

第一，從前我的思想，很有唯物的傾向。自發見了這許許多多的怪現象後，我纔知道自己真的把人性看得太善了；天下事爲經濟史觀所不能解釋的正多，固不僅瑪休士所說的五種例外而已（見胡展堂先生『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我們如其想革命成功，恐怕不是單單的改良外緣所能奏效罷。現在我們同志，正像一家弟兄，往往一樣環境，產出絕對兩樣的人，其實也並不算什麼希罕的事。因此我更想起 總理說的：『兵法有云：「攻心爲上。」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中心之打擊者也！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

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係乎人心之振靡。『真是顛撲不破的公理了。總理所以把『心理建設』，安於物質建設之前，正以此故呵！』

第二，從前我也同許多道學先生一樣，看時事太壞，便與世道人心之歎。近來方才覺得全然不對。所謂『人心不古』，現在倒無往而不遇見相反的現象；明白說：有些青年，正在拚命『開倒車』，想退到七雄三國爭霸鬥智的時代。他們已把世界道德的新潮流，忘記得乾乾淨淨——或許竟是不知道吧！總理說：

『古時極有聰明能幹的人，多是用他的聰明能力，去欺負無聰明能力的人，所以由此便造成專制和各種不平等的階級。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替衆人來服務，這種替衆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可見現在倒是人心太『古』了，所以對於公私的界限，個人和團體的關係，都看不起。那些以共產黨的策略爲新奇，認野心家的手段爲高妙的，不是要叫人笑痛肚子麼？

這兩點意思，無非來證明心理的建設，比什麼都要緊些。現在我更要向最純潔的青年同志，進下列幾點片段的貢獻：

『我們的將來，完全繫在一般青年的思想行爲之上』，這是西洋一個學者的格言。中國的現狀正是如此。我所息息引以爲憂的，就是在革命時期，一切久受理性抑制的欲望與感情，便掙脫一切規範，開始活動。其活動力之所向，當然以破壞方面爲多；尤其是佔有和報復兩種欲望，到了這樣的時代，最易橫決，而成一切爭亂的導火線。這裏我們便要注意：爲什麼近來常有人說，國民黨漸趨腐化是製造共產黨徒的好資料？難道國民黨真個要向不革命的方向走麼？不是的！凡是 總理的忠實信徒都相信這是絕對不會的！不過青

年們強烈的欲望和感情，如其沒有相當的養料來安慰他，倒是極危險的現象。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一般人所以誤解國民黨，簡直完全是給那些野心家弄壞！我們要把『三民主義』從它近來所遭的空前的灰色劫運中，洗刷出它的真義，叫青年們知道自己的生命唯一的養料，就在這個裏面發榮滋長的，其中最要緊的一點，便是 總理的關於人格和學問的主張。

還有，大抵民族生活的下降，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各有兩種很可怕的內在原因：一是貧乏，一是誤用。物質的貧乏，多由於產業的衰落。而精神的貧乏；則係智識幼稚與意志薄弱所致。物質的誤用，以戰爭中自然力的浪費為代表；而精神的誤用，則以損人利己的權術思想為代表，這些都不是理想的大同世界中所應有的。要免除上述的弊害，使民族生活走上軌道，自然，只有從提高智識完成人格入手。將來的革命教育，應該努力負荷這兩重偉大的使命；否則教

育愈發達，文明愈進步，而民族滅絕的危機，也只有愈逼愈近了。所以「貧乏」尙不足慮，惟「誤用」最要不得！現在我們民族的根基還沒有站穩，眼前除神聖的革命工作外，最重要的便是利用自然力來創造物質文明，我們不但要與白色人種並駕齊驅，更要盡力跑過它們的前面才好。如其不去做這種根本工夫，那麼，所謂「打倒帝國主義」，所謂「民族自決」，都不過是「望梅止渴」的把戲，恐怕我們的敵人還要竊笑於後呢！所以我一面極希望勇敢有爲的青年能矢志努力於革命事業的完成；一面仍希望有冷靜頭腦的學者，能畢生從事於各種學術的創造。因爲最後的勝利，畢竟非智識不爲功。華盛頓固是我們所需要的；愛迭生也萬萬少不得！古人說，「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這確是現在中國青年所應當一生頂禮的座右銘！要知道學問的成功，有的須待之十年百年之後，前人開其端，而後人竟其志，正不必功自我立！在這一點上，共產黨是完全失敗了，他

們要用時間和物質的尺，來計算人類精神的貢獻，結果便非智識破產不可了。

所以我覺得青年知識慾之不滿足，確乎會釀成很大的危機。現在的青年，往往還未經過相當的學養工夫，便貿然去參加實際運動。他們既沒有忍性，又沒有識力，稍不稱意，就要反其道而行，而甘心去上共產黨的當。我常見有些青年，頭腦是清楚的，感情是熱烈的，但學問絕無根底，而傲然自滿，意氣不可一世。這些分子，每易犯鹵莽滅裂的毛病，也是我們所當竭力去矯正它的。戴季陶同志好像曾有一種理想：在三十歲以前，只許讀書，不要參加政治，這個目前固然做不到，然為民族的永久福利計，却非如此不可。總理認定革命的基礎，在求高深的學問，正以此故。我覺得現在中國之壞，就在高深的學問家太少；而淺薄的以實行家自命的太多。這樣下去，勢必至於青年們把自己的智慧，盡出於政治社會之一途，在學術的

建設方面，不免要鬧飢荒。而革命大業，依然得不到穩固的基礎。我不禁又想到黎朋的話：『世界所以逐漸進化，而把舊環境改造，必須得力於「智識革命」者的獨立精神。』真的，將來民族的永久生機，還在於積極的智慧上面！

不過在目下過渡時期中，爲一切建國大計的根本解決起見，自不可沒有熱誠的青年來畢生努力於實際工作。然而也要認清目的：革命事業，決不是一人一家及其所識窮乏者的升官發財的機會。所以青年在革命運動中，除對抗我們的公敵以外，絕對沒有運用消極的智慧的必要。這是黨紀的根本問題，希望青年們能夠本這種精神努力！

總之，我們對於近來黨務的糾紛，不必憤悶，更無須消沉。我們的主義，正如正午的陽光，縱有雲翳，剎那間便要消散，而普照大千世界。而最緊要的關頭，反是我們自己的切實工夫——不爲任何外緣與任何私慾所支配的自制工夫！最後，我引羅素的一句話，作全

書的總結束：

『人的善良生活，建立在「智慧」，「自制」與「同情」三者之上。』

(完)





321.7  
T20

聖學